

農村問題探微

牛亦末

一

從中國農村崩潰的呼聲，可以知道中國現階段的農村問題，是較以往更為嚴重了；從研究，討論中國農村的定期與不定期的刊物，風起雲湧，雨後春筍般地，在量的方面日日的增多，可以推測出中國農村問題，是很時髦的；從那些不同的理論，主張，辦法上，又可以見到中國農村研究的學者們，所走的不是一個路綫，所遇到的問題，有種種色色的差別。

占中國全人口數百分之八十以上——據普通估斷數——的農民問題，不得解決，休想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建設等事業，走入正常途徑。歷史告訴我們：中國以往的政治，社會的變動，都有農民作背景。過去如此，現在仍然。然而農民所以成為政治，社會變動的背景者，也是政治，社會有以促而使之然。

人事問題，決不似科學，數學上的諸問題的單純，明析，如 H_2O 相合而成水； $AX^2+PX+C=0$ 是有着一定的方式，規則，無論誰是不能推翻，改變牠的。而人事是流動不居的，是複雜而多方面的；所以一個問題，便牽動着許

多別的問題；想明瞭或解決某一個問題，必須把許多其他相關的問題，詳加考慮，盡量分析，看得清楚，認的明白，然後再加以綜合的研究，理出一個共同的原則，找出一條與各方相通的大路，中國農村問題，才有整個解決的把握；否則，都是牛抵角裏死鑽，結果，仍是「此路走不通」。

二

「有人以爲中國主要鄉村問題是窮的問題，農村經濟破產的問題，愚的問題，農民智識閉塞的問題，弱的問題，農民疾病死亡的問題，私的問題，農民缺乏團結的問題。抽象的說起來，有人以爲是中國文化落伍的問題，中國人生向內的問題，中國內部政治混亂不安的問題，中國外面帝國主義侵略的問題。具體的說起來，有人以爲是農村土地太少，農村人口太多，農村佃農太多，農村利息太高的問題。」除了上邊所述一大串子問題外，自然還有許多別的問題。但是，把以上所列許許多多的問題歸納起來，也不過只是經濟，政治，教育三大類。

中國社會，因了以上的各種問題，才有了各種的病象，想療治她的病症，有許多人在開藥方；但是因爲「我國鄉村問題既如此之多，各人注意的問題又彼此不同，當然解決的方法亦自不能相同，建設方案也是不能相同。並且各人的訓練也不同，經驗也不同……分道揚鑣，各行其是，我們沒有法子勉強他們，去走一條道路，我們也用不着的。」

我們站在平民階級說話的人，自然沒有法子勉強着大家去走一條道路；若說我們用不着去走一條道路，這個我是不敢贊同的，因爲儘管我們瑣碎地去分工，但合作仍是免不掉的，何況最後的目的，都是同樣的。須知我國的病象，雖說尚不致奄奄一息，然而其危險性，是够程度的了；我們要找出一個確切的，有效的方藥，使她吃下去，雖說不能立即復元，但至少要把死亡的危險給解除；現在決不能再以方試病，須看準了病源，然後下方。因爲各人的注意，觀點，經驗，解決的方法，建設的方案之不同，所以大半都是頭痛醫頭，足病治足的局部的，單面的調理，而沒有一個整個的，綜合的辦法；所以試到現在，

成績，我們不敢否認，但失敗，或者可以說，事倍功半。不澈底等毛病，我們也不得掩諱。

三

大部分農村學者，研究中國農村所以破壞崩潰的原因，都側重在經濟方面，所以他們的復興，對於中國農村復興，改造的辦法，也都是以經濟爲入手。楊東莨先生說：「佔中國全人口最多數的是農民，如果農民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則整個的中國問題是很難得到解決的。農民的固陋，農民的保守性，農民的無組織；總而言之：農民的經濟背景，在事實上已經決定農民自身不能單獨澈底解決自己的問題。」舉此可以代表其他農村研究的學者們的思想，和解決農村問題的辦法。

以經濟作整頓，改造中國農村爲出發點的理論，是側重唯物史觀的，以爲經濟問題有了辦法，一切有了辦法；可是多少年的經驗，唯物主義，到現在也會有「此路不通」的感嘆。「衣食足而後知禮義，倉廩實而後知榮辱，」唯物主義者，每喜引管子此言作他們理論的註腳；但是這一句話是極不可靠的，我們且引張東蓀先生的幾句話：「衣食足而後知禮義，是以衣食爲因而禮義爲果，以明其間的前後關係。但我們須知道這種關係有必然與不必然的不同。第一種是衣食足而後必知禮義，這就是說凡衣食足的人，無不知禮義。第二種是衣食足而後可知禮義，這就是說凡衣食足的人可以知道禮義，而反面却是凡衣食不足的人沒有知禮義的可能性。……究竟衣食是對於知禮義是必要條件呢，還是充足條件呢？倘是充足條件，則必變爲凡是衣食足的人，必都知禮義。倘是必要條件，則只能就反面說：凡是衣食不足的人，不能知禮義。但須知凡衣食不足的人，不能知禮義，並不見得衣食足了，便必定知禮義 …。」

證以事實，衣食足的人，而不知禮義者，又何可勝數，所以說衣食足而後必知禮義，這是不通的。……唯物史觀主張經濟因素決定人們的思想，乃是以經濟爲充足條件。倘使以經濟爲必要條件，則沒有經濟，當然亦就沒有思想。因爲沒有經濟，就沒有生活，沒有生活，又安能有思想呢？……世上人所以反

對唯物史觀的緣故，就是因為馬克斯一派人們不僅把經濟因素認為必要條件，並且認為充足條件。……他們的思想是舊了，陳腐了。……管子這句話，不但不足為唯物史觀張目；並且倘使管子所說是真理，則唯物史觀便不是真理。」

我們根據東蓀先生的推理，去檢討一下唯物主義者之解決農村問題的辦法，就是只顧到經濟一方面，而忽略了其他，農村問題，仍然是解決不了。孟軻先生說的：「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的話，也只用一個多字，多字是無定量的一個數學名詞，不能以多而概全體：八口之家，五口便占全家的多數，但是一家之中，五人「賴」而三人「暴」，這等家庭，決不能算是安樂悠優的家庭。以此可以例一鄉，一省，一國。所以也不得根據孟先生的說話，就可以斷定經濟問題解決了，整個社會問題就算解決了。而且「飽暖思淫逸，」貪官污吏，以及有產階級者的犯罪行為，較無產階級者為多；換句話說，富者犯罪多，貧者犯罪少，這不是現在很明顯的事實嗎？我們若認經濟問題是社會問題之一環則可，若把整個社會問題，就認為是單純的經濟問題則不可。

經濟的狀況，影響於農村的組織者固大且多，但農村經濟問題之成為問題者，必有其因。而其因決不是經濟自身，就是經濟不能同時為因亦為果。換句話說，農村經濟的凋敝破產，不是牠本身的原故，而必有其外動的原因；而農村經濟凋敝的主要的動因，是吏治的不良，賦捐的濫徵，外資的侵入，皆是牠的致命傷。

四

中國吏治之壞，至今日已可謂達到極點；北伐初成功時，到處可以聽得到「打倒貪官污吏」的口號，然而打倒了多少，我們沒有一個統計，不得而知；但在報紙上我們却常看到官吏枉法貪贓的記載，如今簡略地抄錄報紙披露的事實，以概其餘。

民廿一年春間平津報紙上有這末一段新聞：「一年來河北省縣長之吞款舞弊者，達一百六十三位之多，省政府正嚴厲查辦中。」河北省現僅有一百三十一縣，而吞款舞弊之縣長竟有百六十人之多，這豈非令人可驚的事！其實倘若

留心報紙上地方社會和經濟的新聞，大大小小的吞款舞弊的記載，若統統都記下來，恐怕比這個數目還要大些。

同年的八月二十三日及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海新聞報上載有浙江省財政廳的佈告，列舉各縣縣長吞佔公款者，計有二十二縣，吞款總數則爲一百五十餘萬。

其餘各省，關於官吏吞款舞弊的情事，真是「罄竹難書」；四川省有一句對縣長很流行的話：「不貪不濫，年可五萬，」實際一個縣長每年的廉俸，上等縣也不過兩萬，然而那「年可五萬」的收入，何從而來，所謂「不貪不濫」者，不過指其算不了大貪大濫而已。

國家設官，所以爲民也；人民有納稅之義務，但所有稅收，不是爲飽私囊，仍當用之於民也。然而我們注意一下現在政治的情形，便可知農村經濟破產有由來矣。因農村經濟之破壞，便呈現不安之景象，近年來各處都鬧着匪患，便也是植基於此，「官逼民反」的一句話，也是有其實事的證據的。

五

貪官污吏之剝削農民，也許不是通國如是，總許有許多清廉自守，潔身自好的，不刮不剝的官吏；但只是那些清廉的官吏，不額外的徵收，多少地方的農民，對於稅捐的繁重，也已無力擔負。中國已往的租稅系統，以消費爲主，少有用之於建設者，而且都是間接稅，間接稅只可加重平民的負擔，如田賦及營業稅等是也。至於大資本之擁有者，如銀行家及自由職業者，概無直接稅之負擔。然國家每年政費，軍事費，開支浩繁，於是苛捐雜稅，名目繁多，農民之收入，屢年減低，而所有負擔，則與年俱增。我們試閱中央大學經濟資料室調查田賦附加稅的報告，便可知一般的農民負擔，是如何沉重：

附加稅超過正稅三十一倍者，如江蘇霍雲縣；超過正稅二十六倍者，如江蘇海門。

預征至民國八十三年者，如四川。

一年六徵，即兩個月徵一年之糧者，如四川廣漢縣。

這不過是僅舉幾個地方作個例子，有的地方許不致如此，但也有的地方，恐比這些例子還要壞。據最近報紙上公佈的各省市廢除的苛捐雜稅，計有二千餘種之多；但除了廢除的部份，現尚存者仍是很多，如據江蘇財政廳所派密員的報告，江蘇省至少尚有二百餘種；天津益世報載，河北平山縣苛雜尚有二十三種，澤縣六十餘種，曲陽縣三十餘種。只就這些例子看去，農民的負擔，仍然在極高度的軋扎下討生活。這是政治不良，而加重農民的負擔的事實，因此便使農村經濟破產了。

六

隨着鴉片戰爭的砲聲而跟進中國的吸血鬼，便是東西洋各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中國是以農立國的國家，而工業則遠落他國之後；所以工業製造品必須仰給於外國工業品的輸入，因此，中國每年的現銀流到外國的，其數量，年年有增無減。據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七十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入口淨值及其指數之增加如下：

一八六四（同治三年） 四六，二一〇，四三一兩 八，一
一九一三（民二） 五七〇，一六二，七五七兩一〇〇
一九二八（民十七） 一，一九五，九六九，二七一兩 二〇九，八
一九三二（民二二） 一，三四五，五六七，一八八元

我國自對外貿易以來，七十年中，除了很少的幾年份，每年都是入超。這種入超的趨勢，是年年向上的增加，試舉民國二十餘年中的幾個年份為例：

民三（一九一四） 二一三，〇一四 七五三兩
民十（一九二一） 三〇四，八六六，九〇二兩
民二十一（一九三二） 八六七，一九〇，〇〇〇兩

出口的數值，固然也年年在增加着，但出口的增加，絕追不上入口的向上的速度，所以自去年自一月份至十月份的入超數目，就有四萬萬二千萬元之多，數量之鉅，堪可驚人，然而去年還是比往年較為減退。其減退的原因，是外貨的跌價傾銷，因外貨的跌價傾銷，便將國內土貨的銷路，幾乎完全杜塞。

農村都市的繁榮或沒落，彼此有相互的關係。都市向上，可以吸收農村的農作物，以爲工業製造的原料；農村興盛，可以吞納都市的工業出品，未有一方偏枯，而他方不受其影響的。中國幼稚的工業，既禁不起外貨跌價的傾銷，則農村的農作物的銷路，自被波及。

至於因高利貸的盤剝，形成貧富的兩極：貧者無以爲生，便挺而走險，良民化爲土匪，農村的治安，便被破壞；富者因畏土匪的綁架，便向都市移動，農村的資金，便流入都市，如近年來上海各中外銀行庫存數量，日日增加，便是一個例證。資金既大量地向着都市流入，則農村愈形枯涸，農民愈形不安，或如上述，流爲土匪，或走往都市，去謀生活，耕地面積，逐年遞減者，便是植因於此，所以以農立國的我國，反成了外貨傾銷的尾閘。試以近五年來海關統計爲例，外米進口的數量如下：

民十八年	一〇・八二〇・九五〇擔
民十九年	一九・八九一・一〇三擔
民二十年	一〇・七四〇・八一〇擔
民二十一年	二二・四八六 六三九擔
民二十二年	二一・四二三・〇九一擔
民二十三年(上半年)	四・四四七・七四七擔

以農立國的國家，每年有如此鉅大數量的外米輸入，不是很可使人驚悸的嗎？因外米的輸入，便把國內的農作物的市場給侵佔；國內農作物既沒有了銷路，農民恃之以爲周轉者，便失其活動力，則農場耕地之拋荒，也是必然的結果。這是農村經濟破產之又一因。

七

提倡農村自治，促進合作社，組織農業倉庫，廢除苛捐雜稅，是現在一般農村學家所認爲救濟農村，解決農村問題最要的辦法。然而許多地方保衛團，自衛團等，業已組織起來，以爲肅清土匪，恢復農村治安的入手辦法，「但是多腐化不堪，不唯不能防匪剿匪，且多數與匪通聲氣，狼狽爲奸，」「假借名義，借款

作不正當之用途，其或以高利貸轉貸於人，藉圖私利；（二三，十一，二九上海大晚報）抵押數量之限制甚高，必須抵押二十元，或五十元以上，中小農民，當然無若大之產量，結果，十之八九以廉價收買農產品，押於堆棧，待價而沽；更以抵押所得，為廉價收買農產品之資金；（浙江省生產會議報告書）「農業倉庫的規模雖大於棧號，農業倉庫的取費，雖低於棧號，而牠們的立場，則同以農民的農產物作保證，而貸現金與農民。」這種辦法，還不是和以前的吃人的典當業是同一的軌轍？「農民的需要資金，是在農作物收穫以前，棧號和農業倉庫，對農村現金的供給，則在農作物收穫以後，二者的性質，完全是背道而馳，農民那裏能夠領受倉庫的利益？」（申報經濟專刊九九期），「吾國農村凋敝之原因，最重要者為軍隊之騷擾，官吏之貪污，政府之煩瑣，與捐稅之苛雜。」黃紹雄：農村復興委員會會報），所以石青陽先生復興農村的辦法，是要「免除苛捐雜稅及一切不正攤派」行政院長汪精衛先生也曾以復興農村委員會會長的名義，通電全國，調查捐稅，以為廢除苛雜的先聲。然而其結果則如何？「吾人所聞者，惟見各地鹽斤改用新秤，增加統稅稅率，增加棉紗統稅，直接間接，無莫非加重農民負擔者。然則決議與實行，毋乃相左乎？」（東方雜誌三二卷新年特大號朱隴農村經濟沒落原因之分析及救濟農民生計之對策）。理論與事實，是兩件根本不同的東西；一種法規制度，也不是絕對有利而無弊者。以上的救濟農村的辦法，只是治標的而不是治本的，是一時的而不是永久的，其利其弊，是繫乎人而不全關於辦法的本身。

八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過去的歷史，已把這句話給證實了，此地無須再為費辭。關於一國的政治者如此，關於一鄉一村者，又何嘗不是如此。

國政與村治之良窳，既關乎人，這便牽連到教育問題了。所以有人說：中國農村問題，是愚的問題，想復興，改進農村，非教育不可。但，教育是否可以救國，教育是否是惟一的救國的方法，又現在的教育，種類紛繁，能救國的

教育，又是那一種？關於以上的這些問題，在教育雜誌第二十五卷第一號「全國專家對於教育救國的信念，」一目下，羅列了郭一岑等三十五個專家的意見，或者以爲教育不足以救國，或以爲可以救國，或者以爲教育是救國的方法，然而不是惟一的方法。在這些紛紜的意見當中，我是贊成最後的一說：教育是能救國的，不過他不是唯一的工具。現在只舉吳俊升先生「教育有沒有救國的效能」一文的結論作代表：上文從消極方面排拒否認教育救國效力的事實和理論，又從積極方面舉出教育救國的事實，然後達到教育確有救國的結論。可是這個結論，和過去的樸素的教育救國論不同。因爲我雖信教育確有救國的效能，却也不信教育有救國的全能。如其社會的其他力量不能共同合作救國的事業，單靠教育來救國，國還是不得救的」。教育是一種工具，這種工具的善用，牠就可以表現牠的效能，如其不善用 牠的好的效能不唯不能表見，牠反要爲害於社會。譬之兵器，人可以用之以自衛，然亦可用之以自殺。昔曾聞湯茂如先生言：「平教運動的兩個口號：除文盲，作新民；如其但側重除文盲，而不顧及文盲既除之後的讀物問題 則除文盲的運動 非只無益，而且有害；蓋既識字之人，無良好的讀物 供其閱讀 則必以妖神鬼怪，誨淫誨盜之小說與報紙，滿足其求知的慾望，如是，除文盲的運動，豈非本所以救之，而反以害之乎？」所以復興或改造農村，視教育爲工具之一則可，視教育爲唯一的工具則不可。

孫中山先生上李鴻章書，陳救國之道，以四事相要求，四事者：「人盡其材，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但這一個盡字如何作得到？已往的樸素教育，是否可以使「人盡其材」？中國之辦新教育，既已六七十年矣，而國家仍在雨漂風搖，岌岌可危之中，是亦足以證明只恃樸素的教育，是不能使「人盡其材」的。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教育而忽略了道德的成分，是不足以救亡圖存的。

又孫中山先生之遺囑上有：「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然民衆大物也，誰能去喚醒他？如何喚醒法？醒了以後幹什麼事？如何使他共同幹去？幹往那裏去？」這幾個問題，歸根追源地綜合起來，還只是一個道德的教

育問題。

九

我們知道：一個社會安全，進步，向上與否，要視乎組合這個社會的個體健全與否。有健全的個體，未必就有健全的組合體；可是沒有健全的個體，更不能有健全的組合體。已往論中國道德論者，以為中國人的道德觀念，理論，是超歐美而上之的；可是羣的觀念太薄弱，所以公共道德便消沉，由是而私心太盛，南北不和，連年內戰，便遂之而無已時。然而這私心是原因，還是結果。張東蓀先生認私是結果而不是原因：「我敢說這個私心大重的現象 不僅是由於道德方面而成。換言之：即是中國人私心太重，不是因為中國人在道德上不好，這乃是一個社會問題。是怎樣的社會問題呢？質言之：即由於社會秩序的解紐。因為現在的中國所有的舊日社會紀綱，完全解散了；而同時新的社會束縛，却又未造成，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時代，當然個人的私心，要特別發達起來。」但為什麼社會的紀綱會解紐？是不是道德的問題？是不是因為私心太重，人人只求一己的樂利，而不顧羣衆的好處，才發生內戰，才你爭我奪，才陷中國的政治，社會於混亂，船體的險境？你到一個鄉村去，街衢，道路的不修不治，崎嶇難行，為什麼不修不治，那便是「人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格言的表現。舉此一端，可以例他。我敢說中國人的私心太盛，也是因，也是果。因為私心太盛，才使團體的組織不健全，因為團體的組織不健全，社會便因之散漫，紀綱便因之解紐。為改善，鞏固社會的組織，非去私心不可；欲去私心，便要提倡羣衆道德。「我認為現在中國教育制度中缺乏德育要素，這是實事，因為缺乏德育，所以使學生更昧於作人之道 這也是事實。」

十

「事有必至 理有固然」天下無無因之果，中國農村之有今日，必有其原因；前邊所說的那些問題，以我看：是果而不是因。致中國農村於現在龍蛇恐懼的境地者，最後的原因，是心理的問題，是道德的問題。因為心理不健全，道德不澈底，便造成今日無處無事不私的人心與社會。因私而害公，因私而不問

羣衆，國家的利益，多少年來的內戰，出賣國家，以及在戰爭時，供給敵人的軍需的各種事實，便從此而來。如今欲復興改造農村，固然不能只從農村着手，須由整個社會出發。但無論如何，絕對不能不問心理，不問道德。這條途徑，也許有人認為迂遠，緩不濟急，然而這却是一勞永逸，正本清源的辦法。否則不論什麼生計教育，社會教育，農業學校，農村經濟復興委員會，都是不能澈底地解決農村問題。因爲「農業學校畢業生有百分之幾真的走入農村從事於農業呢？委員們就職以後農村經濟已復興了多少呢？生計教育曾與鋤夫們發生什麼影響呢？我不是對於他們失望，根本就沒有對於他們有什麼熱望。解決農村經濟的問題，不是設幾名委員，便可了事，不是教些農業學生，便可了事，更不是開幾個花園式的農場，便可了事。……我相信：要解決農村經濟問題，絕不是像一般科學先生們所想每畝地多生產一兩升糧食，便可了事的那樣容易罷！」學校建築了，機關設置了，生計教育已有了計劃，然而爲什麼仍然不能解決想解決，當解決的問題？是中國人愚嗎，是不能幹嗎？但據多方面的觀察，不是愚，不是不能幹，是不肯幹，是沒有具着爲羣衆謀利益的思想，簡言之：是沒有公德，是不肯犧牲。爲什麼不肯犧牲？因爲中國人缺乏真正宗教的訓練與陶冶。「我們工作的意義，決不是限於使農民增加一些金錢上的利益。它是指向一種新的公平的社會的組織，一種平衡的文化。或者有人會笑我們誇大，但是我們這一點信仰是必需的。在這信仰上，我們才能爲國家，爲我們同胞服務。我們曾說：在這一件小小的事業中，我們幾十個人能放棄安閒的小姐生活，在烈日暴風中波奔，而覺得樂在其中的，在我個人看來，除了一種宗教性質的熱忱之外，是沒有憑藉的。素來沒有宗教訓練的中國人，使他不能在血液中散放一種不爲自己打算而爲人服務的熱忱，實是中國前途最大的一個阻礙。」

「因爲道德觀念是社會行爲決定的最高表現，沒有他，則所有的社會作爲，如政治，經濟，科學，法律，國防，教育等等便無指示，和批判的標準了。」中國人社會道德觀念的缺乏，是我們不能諱言的，宗教家的熱忱，中國人也是沒有的；因此，肯服務他人，服務社會國家的人是極少的，社會上的一切事業，

便阻滯不前。但，惟有真宗教能產生真道德，能在人心中散放肯爲人，爲社會，爲國服務的熱忱。因此，我們認定惟有提倡，廣播真宗教的教義，實施真宗教的理論，是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惟一途徑，也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惟一方法。

十一

或者以爲宗教的道德觀念，只是些空洞的理論而缺乏實踐性：「現代一般談道德的，仍然是因襲形而上學和宗教的方法，所以他們所有的道德觀念，往往與時代不能調和。他們所有的不過是一些撩人心意的，直覺的，美學的抽象形式，而沒有把道德看成實驗的社會制的統律。所以他們的道德律，缺乏實踐性。因爲他們是想以他們的空想思辯方式去範圍社會，他們並沒有想到去依社會的內容法則去建設道德。」劉真如：道德建設的幾個根本觀念。

劉先生這兒只含混概括的說到宗教道德，只是一種抽象形式而無實踐性。他並沒指出是那一個宗教道德是如此，使我們無從批判討論。現在把別的宗教道德論置而不論，只說天主公教的道德論，絕不是如同劉先生說的那麼一回事。

「你要出汗，才有麪包吃，」人生在現世社會中，必須勞動，必須工作，這是天主給人的一個重要使命，勞工神聖，由是而有耶穌基利斯督的「人子來在世界，是爲服務別人，不是爲受人供奉。」和「先行而後言」的實際表現與整個的犧牲，這不是實踐道德是什麼？再從天主教過去的成績和現在的工作，去注意地考察，就可見到天主教的道德論，絕不是抽象形式，而是重實踐的。現在且讓我引用蔣總司令最近的談話，以作本文的結束：「依我看來公教學校，爲維持中國平安，爲解除人民痛苦，是大有關係的。雖然救中國的途徑不少，到底耶穌基督，依我看來，是我們中國的實在救星，因爲耶穌是人類的救主，因得他的愛情，救贖了普世，犧牲了一切，並自己的生命也捨來爲得這個目的。他心目中沒有別的，除非這個意向，所以他也大大得勝了。現今我們想救中國，正需要耶穌的精神，耶穌的犧牲，方克有效。」我希望一般農村學者，不必好高，不必務遠，不必多研究問題，只要把耶穌的犧牲精神，用自己的行爲來重表演一下，一切問題就可以得到了解決。

鄉村運動者應有的精神

閻樹枏

近二十年來，中國農村被內在的政治屬性的兵亂，匪禍，苛捐雜稅的破壞，已是民不聊生；再加外來的經濟屬性的外貨傾銷，農產品大量的進口的壓迫，以致國內有穀賤傷農，農村經濟破產的危險；他如武力的侵略，促地不知其幾何里，耕地減少，而內地愈覺人口繁殖，有不能容納之勢；白銀流出，亦使鄉村感到銀根吃緊之壓迫；更因文化屬性的各種不良學說的流傳，與中國固有之美風善俗的改變，使鄉村人民彷徨歧途，莫知適從，陷于精神的苦悶，弱者因之而萎靡頹廢，強者因之挺而走險，國是不定，人心不安，使人莫知所以生，莫知所以死，所謂醉生夢死，所謂得過且過的種種毛病，便風打雨侵地充滿了整個社會。

中國是個農業國，農民佔全人口數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住在鄉村，國家大部分歲入，全恃農民稅收，所以農村是中國命脈之所寄，農村破壞，便是中國之致命傷。但爲了以上所述種種原因，國家收入，教育經費，金融流通，無不受其影響，致使大家都覺到鄉村問題的嚴重，政治家，教育家，經濟家，都起來想如何重整中國農村，而農村運動的呼聲，不只高唱

，且有許多學者跑到農村去實地工作，這實是中國最近的一種覺悟，這種精神如能貫徹到底，是亦起中國社會於死境之一法門乎！

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謂方法是也。然方法有矣，工具備矣，而無運用工具之能力，行使方法之精神，而方法與工具，亦只囿於其為方法與工具之環境，而不能有絲毫之實益也。所以無方法之幹是蠶幹，只有機械式的方法，而無運用方法之精神，亦必流弊叢生，中國政治改造的功效之遲緩，大抵種因於此。工具雖為成功事業之要素，然運用工具之人，亦須有相當訓練，譬之機槍，所以殺敵，然在無識之人之手，往往反變為自殺之器，所以運用方法之精神，尤重於方法本身。中國農村運動，乃中國民族自救運動，其目標何其遠大，其任務何其沈重，如作鄉村運動者，無相當精神，其結果也必微乎其微矣。農村運動者應有的精神，粗淺地分析起來，約有三事：

一 要有志願——志願是一種偉大的精神，與慾望不同。一個人作事，如祇為賺錢發財，是謀生吃飯的慾望，不是志願；為得虛名，或為榮譽而作事，亦是慾望而非志願。志願者發於愛物利他的愛情，不祇問個人之利益，之名譽，而工作，而勞力者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蓋因人為有靈動物，其活動之面積，不當囿於物質圈內，而應有其超物質之精神。所謂「人溺己溺，人飢己飢，」所謂「痾瘝懷抱，」「民胞物與」的思想精神，皆係此志願之流露之表現。聖保祿的「與哭者同哭，與樂者偕樂」的行為，耶穌的整個犧牲自己的意願，以完成其救世拯人的大功，尤為此種志願表現的絕頂。人不只為有靈動物，且為有愛情的動物，博愛的思想便植因於此愛情，而所謂志願，亦即愛情之別名耳。有志願，有愛情之人，其成功有益於人之事業，比較他人高出一等，「女子至弱也，而為母則強，」其所以強，乃愛情為其動力，惟母親之愛的範圍，往往不出於其子女的界限。為農村運動者，不可不有為母親之愛，然不得將其愛情界圈縮小，須擴而大之，引而長之，使此愛情包容國內之人人，則中國已往的鄉土觀念，地域思想，可因而打破，如此鄉村運動，才能普遍全

國，才能解救中國的危險，否則你闢一個農場，我辦一個試驗區，這種零星破碎的辦法，究不是救治整個中國農村的最好方法。楊開道先生說：「新村建設要是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運動，而不是個人的行動，……」換句話說：農村運動，當是整個的而非散漫的，但欲其成為整個的而不散漫，那又非俱有高尙的志願，無所不包的愛力不為功。愛無不能，愛無界限，所以非愛不足以使農村運動成為整個的，非愛不足以完全表現農運的成績，故作農運者，須有志願，須有博愛精神。

二 要有偉大的犧牲精神——人間事，往往得意與失意參半，吾人作事，絕不應因一二次之失敗，或些微坎坷，便改其初志，便灰心喪氣。遇失意事便喪氣灰心者，必不能成功，而其所以喪氣灰心，係因其將自己的慰安，寄托在人間的毀譽，或物質界的利害得失；因此，人譽之而動其心願，人毀之便失其主張，如是，整個計劃，便變為數截，外界一有變動，內心便生紛擾，欲其成功，貫徹始終，不亦難乎？鄉村運動，本屬艱苦工作，作鄉村運動者，必須脫除俗見，不顧他人毀譽，不計名利得失，而具一種真知特見，寄精神於高遠，寓愛力於目標，為整個之犧牲，謀人類之幸福，必如是，鄉運才得成功。

三 要有作事興趣——人生樂趣，不在貪婪，不在縱慾，不在安逸，不在物質享受，却在能盡己力，作有利於人之事業。人是動物，要活動，是有靈動物，要為人的活動，表現靈明的活動。何為人的與靈明的活動？即作有益於人羣的活動是也。人類是有着連鎖關係的，我有飯吃，旁人沒飯吃，自己就不快樂，且自己將來也不得安吃，所謂「無惻隱之心者，非人也」是矣。人類所以能相安無事，度其優悠歲月者，全恃互相利他的觀念思想。人類活動是多方面的，然惟一的動力是愛，因愛便發生興趣，因愛便無難易，即難，亦因愛而不畏難。地質學者，對於枯乾無味的礦石，還能有研究的興趣，何況鄉運的目標是人類，能不引起吾人之興趣乎？所以鄉村運動者，要認識瞭解鄉運的意義和

價值，要覺悟人生樂趣，不在名利之有無，而在是否所以利用厚生，造福人群。目標確定了，興趣發生了，信步走去，自然有「豁然開朗，別有天地」的新穫得，而人生觀於以確定，而亦得明瞭人之所以生，所以死，庶不枉生一世，而有負於人之所以爲人。

以上三種精神，爲鄉村運動者所不可少的基本精神，微此三種精神，鄉運便無成功的希望。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院長梁漱溟先生，認清了這一點，所以訓練學生，有所謂精神訓練一門，內分：合理人生態度與修養方法的指點，人生實際問題及中國歷史文化的分析，大都皆爲關於以上三種精神的修養，或對鄉村運動的自信心和深切的認識的培育。

最後的話，是要略述公教之於中國農運的關係。在中國的公教，大半是農村的工作，公教的精神，也完全包括以上的精神，不只包而有之，還要擴而大之，舉而高之，因爲公教工作的園地是人間，而其所希達的最後目的，則不在人間，然在人間的工作，却爲達最後目的的方法，因爲人間的工作是方法，所以必須利用，所希望之目的，不在人間，所以無求於人間，無取於人間，所以才能有整個的犧牲，才能有無所不包的博愛；因爲所希望者遠大而高尚，所以工作才有濃厚的興趣，因而增強其志願；志願堅強，所以雖苦而覺甘，良心有純潔的安慰；精神有確定的寄托，所以雖有失意事而不動於心，雖遇坎坷而不灰於念，再接再厲，壹志奮鬥，此種事實，凡對公教過去歷史與成績稍有認識者，類能知之，此地無須我費詞。我之惟一希望，是要作鄉村運動者，認識公教精神，足爲鄉運取法，更能補鄉運之所不及與不足。而更希望公教同志，對現在鄉運之目標，之方法，之工作，也要細心研究，充分認識，俾便與鄉運學者，有所接觸，有所聯絡，共同負起中國民族自救，復興中國，改造建設農村的使命。

二四，二，二五，于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研究部

農村救濟

雷鳴遠

我們農民的可憐性，他們生活的危險性，真是無可諱言的。救濟農村問題的呼聲，雖漸時髦化，但也可見這問題的嚴重性了。寫此一篇的我，非學者，原不敢高談大論，惟與農人雜居，共甘苦，已卅有五年，自信對於他們的苦況，有實地的經驗及認識。本文以實際，以事實，爲獨一立場；欲就見聞所及，再加數頁在此重要案件內。文字之工否，非所計也，讀者諒之。

強奪吾農人性命者有自內自外的兩種，有爲他自己永遠無從避免者，有屬於他自己的意志，得了善良教育後，當能擺脫者。我們先看一看自外來的侵害，然後再談農民本身的害處：

一早潦：每年爲天災所陷溺的農人，殆無計數之可能，數百萬數千萬不等；農事之苦，只此一端，略可想像！

農人每年耕種之勞，在這情狀下，似含一種賭博性，無論如何勞碌，對於